

# 压力与回应：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 发展观演变的背景分析

张加华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发展困境和压力。新中国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着着力改变国家贫穷落后和应对东西方对抗与冷战的压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临着推进改革开放和着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压力；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着应对错综复杂国际形势和保证党立于不败之地、深入推进国内改革发展新阶段的压力；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临着发展不平衡问题和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多变的压力。面临不同阶段的发展环境和发展任务，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发展问题不断进行探索，逐步形成了带有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

**关键词：**发展观；压力；回应；背景分析

**中图分类号：**D 20；D 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5-0013-07

广义的发展理论研究全球范围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研究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狭义的发展理论研究发  
展中国家如何实现从欠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过  
渡或转化。<sup>[1]</sup>本文是从狭义的发展来研究发展  
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向现代化的发展，  
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者是先发的，而前  
者是后发的；后者是内生型的，是由其内部的各种  
因素自然促成的，而前者是外生型的，始终面  
临外部现代性的刺激或挑战。所以研究中国共产  
党发展观的演变不仅要研究国内形势的变化，也  
要研究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发展观造成的影响。研  
究这一进程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  
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压力，面临  
着不同的发展环境和发展任务；积极应对和破解

发展中的压力，逐步形成了带有时代特点和具有  
中国特色的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

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  
集体面临着着力改变国家贫穷落后和应对东西方对  
抗与冷战的压力，强调“落后就要挨打”，提出  
发展的根本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观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大革命”结束，是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波澜壮阔而又曲折挫折的时  
期。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不断、压力不断。新中国  
初期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一是面临国家贫穷落后的压力。1949年新  
中国成立之始，中国经济“接近世界发展表的最  
底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约50美元<sup>[2]</sup>。毛  
泽东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他多次用“一穷二白”

收稿日期：2012-08-22

基金项目：2011年度全国党校系统调研课题；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JD035）

作者简介：张加华（1972-），女，江苏海安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主任，副教授，研究  
方向为党史与党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比喻中国的国情。“穷”指的是工业不发达，“白”指的是科学技术水平低。他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sup>[3]</sup>年轻的新中国是一个经济极不发达的农业国。

二是面临东西方冷战和对抗的压力。从国际上来看，二战后很快形成分别以美苏为中心两大阵营对抗的新格局。在东西方对抗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国家给中国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威胁”的政策。战争的阴霾始终笼罩在中国上空。20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凸显了中国国防实力、军事装备、工业水平的薄弱，以及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发展差距。这一切都对新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如何尽快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赶上先进国家，改变我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十分关心和焦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sup>[4]</sup>面临这样的发展压力，毛泽东将发展问题与国家安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sup>[5]</sup>他清醒地认识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刻不容缓的，必要的。

基于着力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认识，毛泽东在几个重要历史时期曾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比如，1950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

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明确提出，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这以后，毛泽东多次讲“要学科学，跟自然界作斗争”，“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向自然界开战”等，都反映了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这个思想是非常宝贵的。针对当时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毛泽东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并强调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避免经济和政治上对其他国家的依赖。这些思想在实践中一度得到很好的贯彻，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发展观没有能坚持多久。毛泽东不久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判断，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移，工作重心滑向搞阶级斗争。这一变化过程不是偶然的，除了其他因素以外，和当时面临的国际国内困境压力、国内外形势的起伏变化有很大关系。

一是发展遭受重大挫折的压力。为了急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党中央于1958年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大跃进”的主观意图是想把中国的经济尽快搞上去，反映了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在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但历史证明，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由于决策本身产生的失误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偏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遭受重大挫折。工业、农业、国民经济遭和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损失<sup>[6]</sup>。

二是国际环境明显恶化的压力。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充满着动荡和曲折，中国处于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对抗的地位。1962年上半年，国内形势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又明显恶化。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苏关系不断

恶化；中印边界上的冲突与对抗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与日本建立了“安保条约”关系，美国在南朝鲜驻有重兵，中国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也趋于严重化，在他看来国际上出现了“帝修反联合反华”的逆流。苏联变修了，那么中国有没有这种危险呢？

在内外交困的压力面前，党中央下决心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围绕农业、工业、教育等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并在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党中央高层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分歧涉及到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价值判断，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对甄别平反的认识，对外交往的战略选择，等等。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和一些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王稼祥、邓子恢等持不同的观点。一些观点如“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工作中有不同的观点、看法都是正常的。但是从这些工作分歧中，毛泽东看出了“政治问题”，认为有一些领导人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感到了压力，感到了挑战，感到了威胁。不仅是对他本人，也是对他的路线，对他的社会主义模式<sup>[7]271</sup>。从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到国内防止修正主义，这似乎是顺理成章和不可避免的延伸。1962年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开会的第一天，毛泽东说：“我们除了在国际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在国内也还有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薄一波回忆说：“实际上，他在这里所说的修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1962年上半年的‘三风’（即党内认识分歧）说的。”<sup>[7]282</sup>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写进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从而形成了全党的路线。毛泽东的基本思路也集中到抓阶级斗争上面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是对国际国内发展困境与压力的回应，但这一回应明显地偏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虽然经济调整还在进行，但是它在中国政治中已是从属性的举动，使得中国的发展走了10多年的弯路。

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临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与改善人民生活压力，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形成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发展观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发展之路，是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反思国内外发展经验与教训，正确回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对发展新要求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

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在快速加大。1978年，我国打破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政领导人很少出访的惯例，不断派人到国（境）外访问、学习考察。1978年邓小平出访了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这些出访给邓小平以极大的思想冲击。其他比较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等。

高层出访考察带来了强烈的思想震动。第一，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sup>[8]</sup>第二，没有想到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好的东西值得学习。这些国家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如强调竞争，十分重视企业管理；注重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从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等等。第三，没有想到发达国家普通人的生活

水平和精神面貌变化这么大。在西欧、日本等地看到工人的住房、工资水平、生活条件都比我们好得多。相形之下，我们落后太多了。

二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压力。从国内形势来看，1978年我们国家面临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sup>[9]</sup>。邓小平在1985年8月21日曾经说过：“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sup>[10]</sup>

和国外进行比较以后，邓小平陷入了沉思，他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等问题上打出了沉重的问号。实际上，第二代领导集体承受着如何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压力。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邓小平就尖锐地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sup>[11]250</sup>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sup>[11]380</sup>“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们生活条件。”<sup>[11]381</sup>“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sup>[11]384</sup>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也是发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信号。社会主义绝不能够再像“文革”这样搞下去了，中国再也不能像“文革”这样折腾下去了。

面对发展中的压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分析国内状况和世界大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发展观。在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在南方谈话中，概括为一句话：

发展就是硬道理。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中深刻认识到，要摆脱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要加快改变中国的面貌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必须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十三大更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航向。

当然，把经济发展放在中心地位，决不意味着仅仅把发展看成是纯粹的经济现象。邓小平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sup>[12]</sup>反复强调“两手抓”的方针：在思想建设方面，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在法制建设方面，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在改革开放方面，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协调发展；强调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以后要以更大的力量支持内地的发展等等，初步体现了经济社会必须要全面和协调发展的思想。

三、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临保证党立于不败之地、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以及国内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压力，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发展问题上继续进行理论创新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的13年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着空前巨大的困难与压力。对此，江泽民指出：“我深深感到，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否则我们就不能更好地前进。”<sup>[13]</sup>

一是保证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发生了剧烈变动，出现了被政党研究专家认为带有普遍性的“世界政党危机”现象：各种类型的政党，尤其是长期执政的一批政党相继丢掉了政权。如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共产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尼专业集团、日本自民党等。其涉及面之广泛，震撼之深刻，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

尤其是 1991 年底苏联共产党一夜之间垮台给中国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而党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变化后，党内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惰性的、消极的甚至腐朽的东西逐渐滋生起来，从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严重侵蚀着党员、干部队伍，影响着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增强和党同群众关系的加强。长此以往，“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sup>[14]</sup>怎么保证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怎么保证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讲是既现实、紧迫又长期面临的历史课题。

二是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压力。上个世纪进入 90 年代以来，在国际上，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全球化逐步深入；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亚洲发生严重金融危机；许多国家执政党更迭，政局动荡。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在经济、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的产生的巨大差距给我们带来很大压力。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与国际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社会上新型发展观的出现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和压力。1992 年中国参加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此后，大会所倡导的以人类整体利益为核心的发展观开始逐渐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影响，发展必须注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三是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压力。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标志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对此党的十五大报告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特别是部分国有企业活力不强；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的状况人民群众还不满意，贪污腐化、奢侈浪费等现象仍在蔓延滋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问题较为严重；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地区发展差距还明显存在，城乡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等等。

面对严峻的考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着重从党的执政兴衰的层面来思考

中国的发展问题。江泽民在总结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后认为：“苏联将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公开性过多而改革不足。在中国，这个次序被颠倒过来：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保住党的执政地位。”<sup>[15]</sup>因此他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著名的论断。这个论断突出了发展与执政、兴国与执政的内在联系，强调了发展在当代中国的突出地位，进一步阐明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是发展。同时也只有发展了，用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真正坚持执政为民、发展为民，中国共产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始终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一个关系到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大问题。

江泽民在坚持发展的基础上，对发展观进行了新的探索。除了坚持“改革动力论”外，提出了“创新动力论”。他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以往的发展的新思路。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出实行四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科教兴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思想和观点，使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得到重大的发展。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发展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全局性突出问题与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多变的压力，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形成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了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胡锦涛指出：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sup>[16]</sup>

一是发展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全局性突出问题。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国际影

响力继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相当多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非常突出。如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导致地区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就业问题十分突出，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非常严重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将影响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新的形势和任务，客观上要求党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有新的突破和创新。

二是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多变。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但也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 and 潜在风险；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2008年11月2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9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将突出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压力，突出面临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突出面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突出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更为迫切的压力。能不能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对党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针对这些压力和考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坚持与完善。2003年8月2日至9月1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工作时第一次使用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随后，在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对这一概念作了阐述，增加了“以人为本”的提法，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完整表述。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作出了精辟的概括。首先，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其次，推动科学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以人为本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的目标，使党对发展的目标有了新的进一步的认识。再次，根据发展的新要求，赋予发展以新的内涵，强调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发展可持续性作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好。最后，必须坚持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善于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处理好各方面的重大关系。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积极响应，对发展问题不断探索并进一步深化，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越走越宽。这也启示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准确认识和全面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阶段性特征，既要充分把握促进发展的有利条件，更要认清并着力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任务、方针和政策，形成适应时代要求和国情的发展观。当前最重要的是深入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这一长期艰巨的任务，破解发展中的矛盾、困难与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 参考文献：

- [1]夏禹龙. 试论邓小平的发展观[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1999(6): 52-58.
- [2]詹姆斯·R·汤森, 布兰特利·沃马克. 中国政治[M]. 顾速, 董方,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40.
- [3]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29.
- [4]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40.
- [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848-849.
-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下)[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563.
- [7]钱庠理. 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2008.
- [8]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32.
- [9]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

- 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07-10-25 (01).
- [10]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134.
- [11]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 [12]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250.
- [13]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335.
- [14]江泽民. 论党的建设[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363.
- [15]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M].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176.
- [16]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309.

## Pressure and Reaction: Background Analysi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CPC's Views of Develop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ZHANG Jia-hua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faced with different difficulties and pressur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with Mao Zedong as representative encountered the poverty and the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East-West confrontation and the Cold War;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leaders with Deng Xiaoping as representative confronted the pressure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in improving th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with Jiang Zemin as representative encountered the intricac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strived to maintain the invincible position of the Party in furthering the reform; since the 16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Hu Jintao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has been working on the problem of uneven domestic development. Generations of Chinese leaders with their ongoing exploration have gradually formed their views of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views of development; pressure; reaction; background

(责任编辑 丛 琮)